

□烽火岁月 ■吕南勋 文/图

在凤凰涅槃中恢复和发展的中共福州组织



杨峻德

大革命失败后,福州同全国一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遭受到成立以后从未有过的严峻考验。面对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他们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福州,“八七”会议唤醒了转入低潮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在凤凰涅槃中恢复和发展,重新点燃了福州地区革命斗争的星火,此后,土地革命在闽东和闽中地区拉开了序幕。

军阀的连年混战为组织的恢复创造了良好机遇

“四三”反革命事变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支持下,国民党新军阀政权在南京建立。闽系海军将领杨树庄率先通电拥护南京国民党政府,继而宣布拥蒋,博得蒋介石的欢心,

即被任命为海军部长兼福建省政府主席、军事厅厅长。5月26日,杨树庄走马上任,在福州开始了福建国民党新军阀政权的统治。这个政权由海军和包括福建民军在内的地方实力派等势力联合组成,省政府、省党部的机关分别由几个军阀势力控制,各个地区也被民军和海军陆战队瓜分。

杨树庄名为主席,依靠的是海军。但海军军舰不能上岸,陆地的军事力量基本掌握在由福建民军改编的新编第一军军长谭曙卿手里。杨树庄的政令出不了福州市,一气之下愤然离闽,向南京中央政府请调军队制裁新编第一军。南京政府遂任命方声涛代理省主席,总揽全省政务。

谭曙卿当然不会甘心为他人作嫁衣裳,又对方声涛暗中抵制。这就使他与黄展云、方声涛、林寿昌等福州地方势力发生冲突,矛盾升级。

10月13日,方声涛借欢迎蒋光鼐的十一军为由设宴,请新编第一军将领陪席。十一军与海军派趁机将新编第一军在省会的部队全数解决,谭曙卿被捕,后获释去沪。但福建军阀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新编第一军余部于10月29日又在泉州成立新编临时军委会,提出打倒十一军、打倒杨树庄。正当十一军消灭新编第一军余部时,第一次粤桂战争爆发,十一军转入粤桂之战。

新编第一军省会的部队虽被消灭,但其他地方的民军大多依然占据着原来的地盘,拥兵割据自固。方声涛只好采取拉拢策略,他一是亲往尤溪,向原新编军的师长卢兴邦祝寿;二是收编了原新编军陈国辉、郭凤鸣两部民军,利用陈、郭钳制卢兴邦。方声

涛还通过杨树庄把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张贞部从南京调回,驻防闽南龙溪一带,致使福建形成由国民党三派军阀割据的局面。

然而,1928年3月,蒋介石借整理全国党务之名对属异己势力的方声涛动手,以改组福建省党部名义迫使方声涛5月辞职。

此后,各派福建民军和海军纵横捭阖,重组为闽北系与闽南系两大派系。以卢兴邦为首的闽北系军阀代表地主阶层;以张贞为首的闽南系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这两派势力在八闽大地你争我夺,激烈角逐,史称福建“南北之争”。

1930年1月6日,卢兴邦发动了震惊全国的绑架6名省政府委员的“一六”政变,引发史称“刘卢战争”的福建内战,最终以卢兴邦兵败结束。

连年的内战导致军费的开支庞大。为了维护统治,国民党当局拼命搜刮钱财,除了各种苛捐杂税,还发行名目繁多的公债,占了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正是军阀的连年混战而无暇顾及,为福州地区共产党组织和党员的恢复发展创造了良好机遇。

逆境中恢复与重建的中共福州组织

国民党“清党”的白色恐怖并没有使共产党人屈服,他们在恶劣环境中继续战斗。“四三”反革命事变劫后余生的20多名中共党员,一直保持着革命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尝试联系失散党员,恢复中下级组织。

1927年7月,中共中央派陈昭礼、陈明(陈少微)回福建重建和恢复党的组织,指示:“闽省暂时划分闽南、闽北两区。兴化、泉

州、厦门、漳州、龙岩、汀州各属为闽南;福州、南平、邵武、建宁(即建瓯)所属为闽北。各设临时委员会管理之。闽北临时委员会隶属中央,闽南临时委员会由粤省委指挥。”

8月上旬,陈昭礼一行抵达建瓯,即与从上海秘密回到建瓯的葛越溪、季永绥、潘作民等人取得联系,成立了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陈昭礼任书记,潘作民任组织委员,季永绥任宣传委员。陈明则到闽南,于8月中旬成立了中共闽南临时委员会。

根据中共中央致中共闽北、闽南临时委员会信中提出的“闽北中心应渐移至福州”的指示,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于8月派葛越溪到福州,在北门马鞍乡与恢复组织关系不久的苏建维取得联系,又恢复了张钊丞等人的组织关系,随后恢复和发展党员40多人,于9月建立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福州办事处,葛越溪任书记。

12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合并闽南、闽北两个临时委员会为福建临时省委,陈昭礼为省临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越溪为省临委执委。成立中共福州市委,归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翌年8月改为中共福建省委)领导,罗石冰任书记,党员110余人,将建瓯县委、政和支部、莆田、仙游、沙县、整个闽东地区以及福州附近郊县等党组织均归中共福州市委领导。

在积极恢复发展党组织的同时,福州的团组织也开始恢复。1928年1月中旬,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在厦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决定把福州列为团的工作重点地区,要求在没有团组织的地方尽快成立组织,强调发展工农分子入团,要求工农分子要占50%以

上;并对党团员的年龄标准做出规定:以23岁为划分标准,23岁以上为党员,23岁以下为团员,18至23岁的党员兼为共青团员。

1928年1月,共青团福州市委成立,团市委书记张肇铿,隶属于团福建临时省委(同年3月后属团福建省委)领导,开始有第一高中、第一高中第二分校、福建中学等支部,团员23名,此后发展了8个支部,团员达35人以上,陈之枢、陈宗远、黄增琦、邱小波等先后担任了书记。

由于语言隔阂,罗石冰1928年1月离闽赴沪,由杨峻德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7月,城区已发展党员80多人,郊区党员百人以上。8月,因叛徒出卖,部分组织受破坏,城区党员降至20到30人。此后,历经革命风雨的洗礼,意志薄弱者不断被清出队伍,而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不断纯洁壮大着这个组织,体现了共产党员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革命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1929年3月-1930年,由于斗争形势的严峻复杂,中共福州市委书记变动较快,陈仁材、杨峻德、邱泽林、曾一贯先后主持了市委工作。

中共福州市委从重建时起就先后在福安、霞浦、宁德、寿宁、福鼎、永泰、连江、长乐、古田、崇安、建瓯等地发动群众建立组织。市委派遣了大量在福建或者省外读书的学生党员或积极分子回乡发展组织并开展农民运动,这是福州市委(中心市委)下辖的闽北、闽东、闽中各地区党组织建立或恢复的主要途径,也是党组织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深入工农群众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扎根工农群众运动的主要特点。

□访古探幽 ■江旭升 文/图

祠台双泡泉井

祠台又称凤台,地处连江县北部山区,现属东湖镇祠台村。村庄的东北侧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小山丘——两公山(江氏始祖次子江廊鑑,字君丽),山上植被茂盛。山脚下菜园边有两口相邻的古水井“双泡泉井”,村民称之为“上井”与“下井”。井深约2.5米,井筒是四方形,井壁为花岗岩长石条修砌,井口呈八角形,直径约2.3米,隐含“四面八方”之意。井栏高出地面约80厘米,井台约15平方米,由水泥砂石浇筑而成。“上井”井栏上阴刻两行“双泡泉井,一九八五年秋”字样,井水呈靛蓝色,深不见底。“上井”的出水量大于“下井”,两口水井看似各自独立,其实又相互连通,当“上井”的井水漫到一定高度时,就会通过暗道流入“下井”。井水常年保持稳定,即使是大旱之年,也从

未干涸。“上井”靠近山体一侧的土坡上嵌着一块长方形青石古石碑,长约1米,宽约45厘米,厚约5厘米,上刻“明宣德年间廊镜公新建两井立”十三个大字(江氏始祖长子江廊镜,字君美)。

据《凤台江氏族谱》记载,明初始祖江福显随驸马郡王仗剑入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领军屯垦祠台。明宣德年间江廊镜遂移居到此,至今已传二十二世,繁衍子孙后代2000多人。同一时期先后迁居祠台村的还有“石氏”与“刘氏”,以及后来的“朱氏”等,他们都称先期到达的江氏一族为“对面江”。刚到祠台村时,江氏先民在伴山溪畔、无名山下结茅而居(现留古建筑遗址),过着开荒种地,挑水浇园的农耕生活。相传,一天夜里一头将要生产的母猪越圈而出,第二天在2里地外



井旁古石碑

一处叫“青盲里”的地方被找到,并产下小猪仔一窝。乡民认为这是母猪引路,是个好彩头,这里必

是风水宝地,因此将居所搬迁过来,并开凿水井以供饮用。

祠台村自明代聚成村落以

来,先后共有十多个姓氏定居于此,但唯有江氏一族人口发展较快,占全村总人口数六成以上,乡民认为这些都得益这两口古水井的好水质。

过去古水井旁边有一方大石臼,外方内圆,臼窝像一口大铁锅,深约50厘米,一次能装井水200多斤,是村姑农妇天然的洗衣盆。夏季,一些小男孩喜欢往石臼里加满清凉的古井水,把它当成洗澡盆。由于沧桑巨变,老石臼现已不知去向。

笔者通过对祠台村的地形地貌、人口分布,以及族谱等相关资料考证分析,认为当年“对面江”搬迁到“青盲里”后,为了生存开凿了“上井”,后来随着人口增加以及耕种土地的拓展,又开凿了“下井”。这两口古水井最早开凿时间是在明代宣德早期,至今已近600年历史。

饮水思源,1985年祠台江氏后人集资重修“双泡泉井”,以念先辈,以感恩德。